高行健获奖之后

高　文　军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一家华文民间通讯社－多维新闻社发布一条独家新闻：中国旅法作家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大概是有关报道中最早的一个。这个消息后来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开去，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诺贝尔文学奖年年评，年年爆冷门，本来不奇怪。而这一年，却是有些不一般。一是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百年，世界各大洲都有其得主，而中国作家获奖，还是开天辟地第一遭。二是高行健身份的特殊性。说他是中国作家，不够十分准确。因为他已于１９９７年获法国国籍，而不再是中国公民。但他的作品，又确实是用中文根据他在中国的生活创作的。这就造成了对作家及其作品定位时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三，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及反映又特别的不同寻常，并由此导致整个评论界的表现极为微妙。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非常明显的存在着什么，令人不由得想要对其进行追究，想要对隐藏其中的东西，能够尽可能的做出稍微深入一些的触摸和整理。

在论及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之前，先有必要对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有个大致的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２０世纪七十年代末为止），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不知诺贝尔奖为何物。而实际上，早在１９２７年，诺贝尔文学奖就与中国新文学，有过一次擦肩而过的邂逅。当时，瑞典考古探险家到中国考察，曾与刘半农商量，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候选人，并由刘半农托台静农致信鲁迅，征询其意见。而鲁迅也郑重其事的给台回信，认为：“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1]要说鲁迅得诺贝尔文学奖，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应是当之无愧的。而鲁迅的考虑，则显然远远超出了一己的名利，而显示了他那一以贯之的对中国国民性批判性关注的博大情怀。

在那以后的时间里，诺贝尔奖似乎离中国人越来越远，中国在自我封闭的年代里，自然也远离了世界上的一切。直到八十年代初国门再开，随着新、老外国

文学（二十世纪的和与此之前的）日益广泛的被翻译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就象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地吸引住了人们的注意。一时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选集”之类的书被各地出版社竞相出版，中国作家中谁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与稳定，却已不再是铁板一块，使得一些优秀作品破土而出成为可能，此时的中国文学，距离那象征着文学创作之最高峰巅的诺贝尔文学奖，好像已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客观形势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经济建设想要向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的同时，文化的发展也成为日渐迫切的要求。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比起来，一是拥有自己几千年文化的悠久历史，同时又占有着当今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一旦发现自己竟长期被拒于这一世界范围的文学最高行列之外，那种焦虑与不安，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情绪化的东西，来的也就分外强烈。于是不知不觉中，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梦萦魂牵、难以解开的“情结”，“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也自然而然的成为文学评论或相关文字中出现率频繁的一个新词语。

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的或者是文化的背景之下，２０００年—尽管称这一年为２０世纪之末还是２１世纪之始曾众口不一，却恰好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的第一百个年头—这一世界瞩目的文学大奖，授予了已定居法国的华裔作家高行健。消息传开，舆论哗然。不仅是高行健获奖这一事实令人惊异，各方面对这一事实的反映，也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所及。时至今日，已事过两年。尘埃甫定，喧嚣之声也不再那么高亢激烈之时，我们是否有可能静下心来，对两年前那件无论是在中国文学或者是世界文学的范围内都不该被轻易淡忘的事，做一番重新梳理？

“红杏出墙”

按照一般常理，在中国如此众多的文学读者和创作者们多年的殷殷期盼之下，终于有汉语文学作品的创作如愿以偿荣获桂冠，当然应该是普天同庆。但事实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据前面所提“多维社”的及稍后香港出版的相关报道，中国官方最早做出反应的是外交部。但在信息泛滥的今日，网上所传的种种固然是“无风不起浪”，其可靠程度却令人不得不持谨慎态度。唯一可为确凿事实凭据的，当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人民日报　海外版》的第二版“要闻版”上，有一篇题为“中国作协负责人指出　诺贝尔文学奖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权威性”的短文，现全文转抄如下。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３日电　瑞典文学院１０月１２日将２０００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

高行健１９４０年出生于中国江西省，１９８７年到国外，后加入法国国籍。

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

这是可以查到的当时唯一表达了中国官方对此事所持态度的正式文章。在同一天的其他报纸比如《光明日报》上，这篇短文一字不差的也被刊载。据说在当天的有些地方报纸上，因为上面旨意传达不够及时，已有半版的篇幅对高行健获奖一事做出报道并及时发行，但笔者限于条件无法找到，难以为信。

高行健获奖一事被传开的同时，正值中国政府总理朱镕基访日期间。据说，在日本的朱镕基有这样一番发言："我很高兴用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获诺贝尔奖……相信今后还会有汉语或华语作品获奖。很遗憾，这次获奖的是法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但我还是要向获奖者和法国文化部表示祝贺。"这段很象是出自朱镕基之口的话，当时在网上盛传，后来被收入香港正式出版的书籍之中[2]，稍稍安抚了一下民心。但很快在网上又看到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的讲话，指责上述所谓朱镕基讲话是谣言。

不管朱镕基所说是否谣言，从可以看到的消息中，做出中国政府对高行健获奖一事持不欢迎态度的结论，应该说不会大错。《人民日报　海外版》上所谓作协负责人的发言，还仅仅是一种对外姿态。而对内部如何强行控制，一般人就很难详细了解其真相了。笔者尽管从在国内出版社做负责工作的朋友处听到一些具体情况，但那毕竟是口头之谈，不足为凭。特别是当今政府对文学艺术一直到整个舆论界采取的是"外松内紧"政策，不再取以前那种动辄搞"口诛笔伐"之蠢举，对外界很少"留下把柄"，内幕真情就不容易被看穿窥破。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信息网络化的现代科技成果使得人的主观意志显得力不从心，何况，我们还有个"一国两制"的香港。从网上看到，香港有个杂志《二十一世纪》，高行健获奖后，该杂志与其他同行一样闻风而动，其２０００年１２号的「二十一世纪评论」专栏即办成了"高行健特辑"。其中第一篇文章题为"文学与写作答问"，署名作者高行健，实际上是高行健与采访者的对话问答。

值得注意的是该稿来源。在正文之前，有这样两段说明文字。

> １０月下旬，突然接到乐黛云先生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有篇质量很好的稿子，内容是金丝燕、王以培于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８日在巴黎与高行健就有关“文学与写作”所做的访谈，完全是非政治的。但是，她近日接到通知，这篇文稿不能在她主编的刊物上如期发表了。“你们一定要争取这篇文章在今年内登出来啊！”听得出来，她语调中的割爱之痛。就这样，人家不得已而弃之，本刊乐意取而用之。在此，要感谢乐先生热心组稿荐稿，并按她的要求，在文章前登出她的一段说明文字；还要特别感谢金丝燕对高行建访谈并整理文稿（文章小标题是本刊编者所加）。　　—编者

> 这篇访问记原为《跨文化对话》而写，拟於１１月出版。当我正为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兴高采烈时，却被告知此访问记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我根本不相信，理由是：（１）本文不涉政治，只是讨论尊重人性、自由思考，并不“犯忌”；（２）此文完成于今年１月，与如今被作为“禁忌”的诺贝尔文学奖不相干。然而，我终于被正式通知此文不能刊登！唯一的理由是全世界都在谈论的这个名字—高行健—不被允许出现於大陆任何报刊！悲夫！幸而中国之大，还有邓小平一手开创的一国两制的香港，这篇既富前瞻性，又有理论高度的访问记终于还可以和国人相见。
>
> 《跨文化对话》主编乐黛云　２０００，１０，３０

这篇文章后来收入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高行健的理论著作《文学的理由》（２００１年４月初版）一书中，只是上面所引两段文字不见了，而代之以这样的说明：

> 本文是金丝燕、王以培於２０００年１月１８日在巴黎与高行健就有关“文学与写作”所作的访谈，并由金丝燕整理。文中的小标题是《二十一世纪》首次发表时编者所加。

幸亏有《二十一世纪》可以接过《跨文化对话》所割之爱，更幸亏有乐黛云这样的老先生肯愤而为言。否则，人们对高行健获奖后何以在海外（包括香港台湾）被叫得山响，在国内却倍遭冷遇的事实除了莫名惊诧之外，又何从得知其中

底里？“墙内开花墙外香”，不仅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在新旧世纪之交，居然又一次为“党文化”作了一个小小的脚注。

二，众说纷纭

从上面所引乐黛云先生的短文看，在国内禁谈高行健，是今日中国出版界一个人为造成的事实。当然，这一事实反映的是当今的“长官意志”。但是，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拥有那么多的文学读者，文学创作者，还有那么一大批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又哪里是“长官意志”想“禁”就禁得了的呢？国内不让说就国外说（包括境外），正式的不让说就非正式的说，何况仗着现代科技的发达，还有令“长官意志”鞭长莫及的网上天地。本文在下面将引用材料的主要来源，不外于三：1，网上所见；2，港台出版物；3，日本出版的中文报刊。需要说明的是，从正宗学术研究的意义上看，这样的资料不够正规，也许不足为凭。但由于研究对象被置于这样一种特殊待遇下，不得已只好取此下策。

高行健获奖的消息传出后，除了在国内被禁谈，无法直接了解外，从境外可以搜集到的材料看，大约有这样一些反响：

1）赞成派

在台湾和香港地区，这几乎是人们的第一反应。本来嘛，在使用范围如此广大的华语圈，一百年来首次有人获此大奖，焉得不放声欢呼。曾经因为不易阅读而遭冷遇的高行健作品，一夜之间变得人气百倍，供不应求，出版社不得不一版再版。作为本文论题的主要材料，当然，笔者更关心的是评论界的反应。

最早发现高行健文学创作的价值并毫无保留的为之歌鼓的，当推刘再复了。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不仅早在国内时就出自文学的信念而推重高行健的创作与理论，而且后来高行健代表作之一的《灵山》手稿，就是由刘再复夫妇帮忙打字整理后交给马悦然，其出版问世都与刘有直接关系（另有说法与此不同）。1 9 9 9年4月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刘再复慨然为跋。在跋文中，刘再复如此宣言：

> 我完全确信：二十世纪最后一年，中国一部里程碑似的作品诞生了。

高行健获奖后，赞美之声纷至沓来不足为奇（在海外），刘再复敢在他获奖之前就如此断言，而且又如此一语中的，除了说明他审美感觉的敏锐与丰富之外，

又岂有他哉。

再早一些，１９９３年，高行健的剧作《山海经传》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刘再复为其作序。其中对高行健的《灵山》，刘再复有这样的论述：

> 这部小说，上溯中国文化的起源，从对远古神话传说的诠释，考察到汉、苗、彝、羌等少数民族现今民间的文化遗存，乃至当今中国的现实社会，通过一个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长江流域奥德赛式的流浪和神游，把现时代人的处境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联系在一起，加以观察。他毫不回避中国的种种社会现实，哪怕中国当前的政治。但不止于一般的抗议和揭露。他那种透彻的怀疑主义导致的思考和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教化的反思，浸透了自嘲，其所具有的颠覆性比一般的揭露远为深刻。他对现今人的生活方式，对自我，乃至对语言的质疑，都毫无矫饰，达到一种不可尽言又无可言说的境界。
>
> ……作者对心理活动的刻划，诉诸东方式的静观，又游笔于种种玄想，同样也淋漓尽致。

这段话，说于１９９３年夏，比高行健获奖早了七、八年。说“先见之明”之类的可能失之于玄乎，但起码可以证明，一种对于文学作品的真知灼见，是完全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２０００年１０月，高行健获奖消息传出，与大陆人为禁止相反，港台地区很自然的热闹一番。出版社各显神通，一时间有关高行健的书出了好多种。就笔者能搜集到的范围而言，其中质量最高的，当数刘再复著、明报出版社出版的《论高行健状态》（２０００年１１月）。收入该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写于高获奖之前的。

客观的说，刘再复多年身居海外，能够比较及时的看到高行健的各种作品，并搜集到有关信息，对形成他的见解，促生他的评论种种，都是非常有利的。相对来说，在这一点上，身居大陆的评论家们显然不利一些。除了早期的代表作品，如《绝对信号》《车站》等在国内上演、发表过以外，更为重要的代表作品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授奖颂辞中提到的作品，都是１９８９年以后陆续在境外出版的。这些作品，在国内连看都不容易看到，更遑论评论了。所以多年来，不仅是年轻人不知高行健为何人，评论家们对他的创作活动及作品倾向，好像真正很清楚的不是太多。这是从香港出版的几本相关书籍中可以得到的信息。一本是明报出版社的《解读高行健》，还有一本明镜出版社的《高行健评说》。前者主要是当时香港几家杂志上有关文章的汇编，包括高行健接受记者访谈。现居大陆的作家评论家的文字几乎没有。而在伊沙编著的《高行健评说》中，有一章题为“天下谁人

不说君”，据编著者说是从各种报刊、网络上搜集到的“各路人物的评价”。其中出现的大陆作家评论家的名字，有陈思和、王安忆、陈平原、吴福辉、舒乙、莫言、丛维熙、陈村、王吉隆、刘心武、孟繁华、潘军、池莉等，但大家所言及的，还是以早期剧作为主，大部分人坦陈对他后来的小说不了解。

尽管受国内条件限制，想要看到高行健的作品并不容易，但面对高行健获奖这一强烈冲击，人们几乎是本能的做出各自的反应。而透过这种种近乎无意识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隐藏其后的东西。

比方说，就笔者所能搜寻的范围看，国内评论界极具个性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当时起码有两次以上的发言。一次是在日本发行的中文报刊《中文导报》通讯员丁厥就高行健获奖一事走访在京学者，其中第一篇就是钱理群的发言[3]。钱理群一开头就旗帜鲜明：

> 值此二十世纪末，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以现代汉语写作的作家，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

之后有这样的说法：

> 高行健的获奖作品我没有读到，我看过的是他的早期试验剧。他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创作于八十年代的如《车站》、《绝对信号》、《野人》等在中国影响很大。
>
> 就戏剧观而言，他对中国传统的戏剧做出了挑战，影响很大。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情、语言上的表现能力、想象力、创造力，都显示着他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具有一定道理的，显示出了评选委员会的眼光。
>
> 从另一方面看，高行健对于中国的大多数读者是陌生的，他的主要作品都发表于国外。在世界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这是正常的，但这一事实也同时反映出我们中国本身的一些问题，是中国的悲哀。虽然说文学是全人类的，但高行健的才华未能在国内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很可惜的，而中国作协的反应则是莫名其妙的。指责别人政治性强，反映的正是自己的政治意识强，反映的是一种极端狭隘，而这又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作为中国学者，我为高行健获奖而高兴，同时也为他的才华未能在中国本土得到施展，为他的作品至今仍不能与中国广大的读者见面，而感到双重的悲哀。

第二次，是前面提到过的香港杂志《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号“高行健特辑”中，也有钱理群的文章，题为“现代汉语文学走过的路”。在这里，钱理群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回顾了“以五四文学革命为起端的”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过程，只在文章的后半，才正面谈到主题。

> 本世纪最后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位现代汉语的写作者，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的。而由高行健获此殊荣，在我看来，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如前所述，他是一位对现代汉语文学有着自觉追求的语言艺术家，８０年代他在中国本土从事创作时，就是实验性戏剧的主要代表作家之一，他对现代话剧观念及语言的创新，已经显示他无拘的创作力。９０年代他又成为华文文学创作的重要代表作家，更自觉的“将自己对（东西方）两种文化及传统与现代的体会，灌注到创作中去”，他所坚持的独立的个人性的写作立场，以及他对“现时代人的处境和人类普遍的生存状态”的关注，都使他与五四开创的现代汉语文学的传统有了更高层次上的承接与发展。他的作品所显示的原创力与想象力，说明这是一位有着巨大潜力的作家，人们有理由对他寄以厚望。

钱理群对高行健的正面论述可谓不多，不多的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因为没看过其获奖作品。而未读过高的获奖作品的在国内是绝大多数，为什么钱理群是毫无保留的予以肯定，在另外一些理论家那儿又会导致完全相反的反应呢？这，就是本文在后面想要重点讨论的问题了。

比钱理群更为详细更为具体、并且也是从正面做出肯定的另一位理论家，当数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晓明了。陈晓明的文章，与钱文一样发表於同一期的《二十一世纪》，题为“从现代主义到没有主义”。从时间上看，文章发表於该杂志的第１２期，与１０月份仓促出笼的那些访谈录之类不同，作者有可能稍微从容一些的对高行健的文学及由高获奖而引发的所谓“高行健现象”作一番梳理，并阐明自己的看法。

> 人们当然可以对诺贝尔文学奖不以为然，也可以对其标准提出异议，但人们不能无视这是一个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事件。人们也可以对高行健的身份和符号排斥或谴责，也可以对高行健的作品说三道四，但高行建始终怀有的那种创作热情，始终站在文学前沿的探索精神，他对生存困境不屈不挠的把握，对汉语的表现力和可能性的无畏发挥，这些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在

我们的生存现实中，人们可以漠视很多东西，可以颠倒、抹黑、搅浑水、抹杀、蒙蔽……等等，但有些事实就真的存在在那里，成为人们不可逾越的障碍。某些历史事实的意义和可能起到的作用，取决于人们的勇气。有时候，某些障碍可能是劫数，人们就越不过去，就在这里纠缠，终至于两败俱伤、鱼死网破；有些却可能是历史契机或新的起点。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作为一个作家，高行健就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人，他的汉语原创作品可能会因此获得一些社会声誉，会给出版商和他个人带来不菲的利益。但作为文学的那些东西，还是有必要放在文学的语境中来理解。它既没有必要被无限制地抬高，正如它也不应该受到漠视一样。特别是在汉语文学圈，为什么就不能平心静气谈谈高行健呢？高行健确实有些政治色彩，回避或抹去都不可能，也无必要。但高行健不是吃政治饭的人，他是一个靠文学说话的人。

和国内的大部分评论家不一样，陈晓明是少数几个看过高行健主要作品的评论家之一，应该说是很有发言权的。但他在文章开头，却并不急于对高行建的具体作品发表意见，而是就这一件事—高行健获奖而国内却禁谈高行健—表明自己的基本看法。与刘再复的振臂欢呼相比，陈晓明还是比较低调的。低调的原因，文学见解的差异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个人处境的不同。然而“一国两制”的差异，虽然令评论家们在意欲言说时表达方式会有不同，基于一种共同的良识，毕竟会心有所通。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学者的发言外，对高行健的文学作品及获奖一事做出正面评价的还大有人在。本文的中心，旨在关注国内评论界的反映动态，对于海外学界的许多精彩之论，大部分只好暂且置之题外了。

2）反对派

前面提到过香港出版的《高行健评说》一书中，收录的舒乙的发言是最为直接的反对意见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开了中国人一个大玩笑。”因为书中没有具体记载，舒乙到底是在什么前提下，在什么环境中，从什么意义上做出这样一个发言的，我们无处知晓，无从可考。只是联系到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发言和舒乙的身份，也并不十分令人生奇。

虽然舒乙身为现代文学馆馆长，但那毕竟只是个行政职务。严格的说起来，舒乙并非理论家，他的上述发言即使是真的，也没有太大的理论意义。相比而言，

倒是一些专门家的发言，更值得人们重视。

因为当时中国政府的策略是“一刀切”的禁谈高行健，所以即使是反对或批判高行健的声音，在国内也不大容易听得到。这里，只好同样利用身在国外的便利，就自己所能搜集到的范围而作个粗浅之观。

与钱理群的第一篇文章一起，同时刊载於日本的《中文导报》上的，有篇作者为张颐武的文章，题目是“诺贝尔文学奖：回归中国？脱离中国？”张颐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在国内是个颇受注目也颇为活跃的年轻学者，发表此文时，正受聘为东京大学客座教员而身居日本。这一客观条件使他可以不受什么限制的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条件下，他说了些什么，又是怎么说的，本文想予以更为具体一些的关注。

张文的第一部分题为“尘埃落定之后”，一开头就有这样一些叙述性语言：

> 二十年来中国文学一直深陷其中的走向世界之梦似乎在这个千禧年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尾，那些焦虑、不安和痛苦的期盼有了一个最后的报尝。中国人真正得到这个奖了！这似乎是挑战不可能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但在一切真正来到的时候，我们的感情有些复杂和难以言说。期盼了太久之后得到的光荣，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荣耀，也没有让我们欣喜若狂，反而让中国人有点不知所措和茫然。看看因特网上那些充满迷惑的讨论，听听混杂着微妙而复杂的情绪的议论，我们真的有点象那位好龙的叶公，在对龙的无限想象中沉醉了那么久，一旦真龙现身，却又感到了不可思议的失落和恐惧。……对于高行健本人，这当然是人生的巅峰，是一次极限的体验，但对于中国来说，这又是一个何等复杂而微妙的境遇。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是一次真诚的肯定？一个机敏的讽刺？是别出心裁还是别有用心？是独具慧眼还是自有偏见？一切都在华文媒体和中文读者开始熟悉高行健的同时摆在了我们面前。无论如何，瑞典皇家学院用一个完全不可思议的行动改写了中国文学史，从此，不管我们是愤怒还是失落或者是赞同，我们都无法绕过这个奖给予中国文化的持续性冲击。

这一部分，还只是表述了一种心态——面对高行健获奖一事。尽管在他的表述中有些说法足以令人生疑，更为值得注意的，还是文章的第二部分：“回归”或“脱离”。

> 高行健无疑是一个有非常深厚的欧洲背景的作家，他八十年代在中国的写作就具有明显的欧洲背景。如对中国话剧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绝对信号》、

《车站》就明显受到欧洲“荒诞派”戏剧的影响。《绝对信号》以一部前行中的列车隐喻“中国”的手法和独特的小剧场形式当时曾经对年轻一代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而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则非常仔细地介绍了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当时曾经引发了作家刘心武、冯骥才等人的讨论，对于中国作家掌握复杂的现代主义小说技巧起过相当大的作用。这些作品与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都是中国“新时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野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思考，并且引入中国南方的神话，进行了比较激进的探索。这部作品当时在北京上演遭到了商业失败，显示当时中国本土观众接受现代主义的限度，也显示了高行健与中国的语境开始“脱节”。高行健的自我流亡实际上并不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西方主流媒体在他获奖后将他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显然是一种商业性的炒作，并不能显示高行健的文化特色。高行健的写作此后于中国的联系逐渐减弱，他的实验面临困难似乎是他离开中国更为重要的原因。高行健移居法国已经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大的变化，高行健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一语境。这里的原因绝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他的探索方向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无论是《灵山》还是《一个人的圣经》，都不再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也缺少许多流亡作家强烈的政治抗议色彩。高行健的舞台已经完全以欧洲为中心了，他越来越成为一个按西方普遍价值来写作的作家，他的成功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中国人进入欧洲文化主流的传奇。高行健到目前为止的文学生涯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属于中国新时期文学，后一部分则完全是置身欧洲文化的写作，与中国社会完全“脱节”，也没有在中国发生任何影响。但这两部分都显示了欧洲文化的作用。对于中国人来说，高行健已经是一个与我们完全脱节的欧洲作家，他的创作显示了“脱离中国”的指向。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辞直接将高行健称为一个中国作家，将他放回了中国语境，也正是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使得中国文化不得不重视高行健。诺贝尔文学奖让高行健“回归”了中国。这是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最为吊诡的地方。

为了不至于导致阅读上的歧义，这里，不惜篇幅，对张颐武的文章几乎是全文转抄。

说实话，对高行健获奖一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口不一是非常正常的。可以有人举臂欢呼，当然也可以有人不以为然。问题是，张文除了在一些关键地方用语含混以外，有些结论性的说法，也显得主观武断，缺乏说服力。

比如说，第一部分，有这样的说法："期盼了太久之后得到的光荣，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荣耀，也没有让我们欣喜若狂，反而让中国人有点不知所措和茫然。"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就显得语焉不详，到底是指普通的中国读者，抑或是所谓"中国作协负责人"所代表的中国人。毋庸避讳，有时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甚至是巨大的。而他使用的"不知所措"一词，在此处更容易让人联想到的，是中国作协的反应。

就在这一段文字的下面，还有这样的话。"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是一次真诚的肯定？一个机敏的讽刺？是别出心裁还是别有用心？是独具慧眼还是自有偏见？一切都在华文媒体和中文读者开始熟悉高行健的同时摆在了我们面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问题是，张颐武在这里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本文前面引证的乐黛云所透露的信息：在中国国内，是禁止谈论或出版有关高行健的一切的。一般读者想要通过作品对高行健有个最起码的了解都不可能，又何谈"开始熟悉"？忽略了这一前提，任何滔滔雄辩都显得苍白，经不住推敲。这也是张文中心论题的一个致命弱点之所在。

张颐武文章的第二部分，想要说明的，是高行健是一个已经脱离了中国文化语境的作家。可是却缺乏有利的论证，只是非常武断的说道："高行健移居法国已经十余年，在这十余年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巨大的变化，高行健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一语境。这里的原因绝不是政治性的，而是他的探索方向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无论是《灵山》还是《一个人的圣经》，都不再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也缺少许多流亡作家强烈的政治抗议色彩。高行健的舞台已经完全以欧洲为中心了"。

在张文中，这种断然而言的结论性口吻随处可见，似乎不容他人有一点怀疑。而正是这种过分决绝的说法，却使人不得不想一下，事实果真如此吗？说的稍微武断一些，张颐武写这文章时究竟看过高行健的作品没有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无论从文章本身的论述（与陈晓明文章中对于高作品的具体论述相对，张文没有提供片言只语），还是当时的实际可能，这一点都是很可疑的。而如果连作品都未读过就下这种结论，恐怕就不仅仅是主观武断的问题了。断言高行健的探索方向已脱离中国，说其作品已不再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都明显的表明了作者是以是否与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紧密联系为标准而做出判断。九十年代在中国大地漫天狂舞的民族主义大旗，被张颐武不动声色的接过来，一方面有意无意的掩饰了许多不应被掩饰的事实，同时，又非常坚决的排斥了同样不被官方认可的高行健。

张颐武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作者立场及观点，应该说，并非完全个人性的。而

正是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教师及评论家的高层次身份，使他这种很具代表性的立场、观点和一些说法不应被人轻易忽视。这一点，也想留待后一章集中讨论。

在当时热闹非凡的网上论争中，作者为郭枫的两篇文章是比较有分量，因而也值得重视的。据多维网编者介绍：

> 今年七十岁的郭枫，是台湾著名诗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新地文学出版社」创办人），著有诗集、散文集、文学评论集几十种，北京大学曾设「郭枫文学奖」。近年作品有《谛听，那声音》（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寻求一窗灯光》（散文集，广东花城出版社），《郭枫散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人民文学出版社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当代台湾名家作品精选》一套十册由郭枫主编。郭枫被称为「台湾的独行侠」，因他不统、不独、不媚外，一向独往独来，运笔如矛，对文学的一些荒谬景象，予以无情批判。他近日完成的两篇批评高行健作品的文章，在台湾《人间》杂志发表之前，特交由多维网独家发表。

郭枫老先生的两篇文章分别题为：《西洋魔笛与高行健现象－评高行健获奖现象之一》和《论高行健的自救策略与小说造作－评高行健获奖现象之二》，而且，两篇文章都篇幅较大。这里，只能择其要点加以介绍。

在《论高行健的自救策略与小说造作－评高行健获奖现象之二》中，郭枫主要从作家世界观、创作理论、语言尝试等方面，逐一对高行健进行了斥责。我们还是具体看一下郭老先生是如何指责的。

> 高行健自中国出走，投向法国。他把这个行动称之为「逃亡」。他说：「逃亡，是自救的唯一方法。」出走也好，逃亡也好，都是离弃自己的母国奔向异邦。行动便是一切，他不必多说理由。如果要说，情况要真实，态度要诚恳，自可得到人们信任。如果夸大的把自己出走称为逃亡，那么他是否遭受政治性的迫害而有什么危险呢？根据高行健的经历、地位和工作来看，他在大陆的作家群中是具有良好境遇的一位；而且，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的形势进展较快，许多留学海外的人开始回到国内，极左路线早就垮台，对他没有政治迫害的问题。所谓「逃亡」，很难有让人信服的解说力度。不过，高行健把「自救」和「自由」挂上钩，在争取自由的旗帜下，他以高亢的调子出现，否定爱国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卸除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群的责任和道义

等等，都成为合理的论调了。因此，竟可以被赞扬："一个不屈不挠进行精神追求的作家与艺术家，旗帜鲜明的支持了自由写作与自由表达的权利。"（原文注 2，引自刘再复《论高行健状态》）高行健的「逃亡」乃成为「自救」的英雄，且建立了一套「自救」的堂皇理论。

高行健首先申明反对"爱国主义"的立场："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把救国救民的重担压在自己肩上。中国知识分子能否有更好一点的命运？确认个人自身独立价值的时候，能否既不当救世主又不当牺牲品？"又说："这种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不能不说是阻碍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不移确认个人价值的最大心理障碍。"随即，他又指称："爱国主义是对个人的陷阱。"这些言论充分表明高行健否定爱国主义的态度。要不要爱国？可以由他个人的意愿决定。可是，他的言论具有不小的影响，其中有些最基本的错误看法是应该讨论的。其一，知识分子不是天生的，是国家社会的力量培养出来的，接受培养成才后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作一些服务，这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反馈，是一种良心上应有的作为。知识分子爱国这不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理么？其二，所谓知识分子把救国救民的重担压在自己肩上，该是值得尊敬的崇高行为，又有什么不对？中国的读书人，历代就有"淑世精神"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我期许。这是读书人的胸襟和抱负，是自愿担起的道义，并非儒家的教条。谁要去寻找"好一点的命运"不愿有此负担，可以；但不可以反诬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为非！其三，高行健举蒋介石、毛泽东均曾以爱国主义为号召籍以遂其统治的事例，来证明爱国主义"是对个人的陷阱"。我认为这些议论看似合理，其实是"言伪而辩"。须知古今的独裁者莫不善于利用公认的道德教条来愚弄人民，徒有知识而无智慧的人，便会跟着疯狂，甚至以"造反有理"而洋洋自得。若不是总有一些清醒的知识分子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无我无私，前赴后继，做出牺牲奉献，则人类历史早已永远为魔鬼统治史，焉得有今日之文明与民主。高行健拿这种诡辩性的例子来挑起人们残存的仇恨，煽动反对爱国主义的情绪，实乃是诛心之论。

高行健接着申明他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中国知识分子在摆脱国家迷信争取民主政治的同时，能否不重新落进民族主义的巢穴中去？"又说"人道主义也好，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也好，无政府主义也好，描绘了种种乌托邦，如今，都已幻灭。却只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到处蔓延。"在这里，高行健指称民族主义是陷害知识分子的"巢穴"，认为当今世界上民族主义正在到处"蔓延"，是"狭隘的"有毒思想。已经是法国公民的高先生，若非单纯天真

的认为自己完全是正确的，便是蓄意顺着西方反对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论调，故而讨好取媚，同声应和。姑不论其他各种主义如今是否都已幻灭的问题，仅从民族主义来看，整个第三世界（甚至美、法、英、澳等国的有色人种）民族主义方兴未艾，势难阻遏。何以故？这正是高行健避而不谈的资本主义所制造出来的。试看如今横行世界的资本主义霸权，对第三世界落后国家正以新型的经济鲸吞代替旧式的殖民占领，而为了消解被剥削者的抵抗意识，“世界一体”的调子便从西方强权的口中高唱出来。面对侵略者的强势侵凌，贫穷的、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除了高举民族主义来号召同胞作微弱的抵抗之外，再无其它办法。在此情势下落后国家是不能丢掉民族主义去搞世界主义的。孙中山先生说得好：“民族主义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求生存的宝贝。丢掉民族主义去讲世界主义，将一无所有”。刚刚取得法国籍的高行健，马上便谴责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思想，未免转变得太快了些。

以上是郭老先生对高行健基本思想的批判。除此之外，还有对高文学概念及语言使用的批判。在此后的一章里，郭枫把高行健的“三个真相”概括为：“绝对的个人主义”，“空虚的伪现代派”，“造作的‘语言流’”。通观全文，他基本上始终是从这三个方面去批判高行健的。因为篇幅较长，对后两点只好姑且置之，只就其最主要的第一点略作一些讨论。

和前面提到的张颐武的文章比起来，郭枫的文章应该说还是比较严肃的。因为作为文学评论最起码的一点，他看过原著。不仅看过高行健的小说作品，而且对高行健的理论文章也好像看得相当仔细，并且在自己的文章中广为引用，起码在一定程度上使文章具有了事实可信度。

问题是，郭老先生到底是身居台湾，在对中国现实政治及社会的理解上，还是存在一定隔阂。否则，他可能就不会简单的断言“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的形势进展较快，……极左路线早就垮台”等等。不能小看了这“隔阂”。这虽然不同于“隔岸观火”的“隔”，“隔靴搔痒”的“隔”，却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他捕捉比如说与前面所提乐黛云透露的那种信息类似的信息并充分体会其中蕴藏的全部内涵。不仅如此，不是身受其害，对压制了人们多年的一种无形势力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恐怕也很难体会何谓“深恶痛绝”，及欲与此绝决的痛烈感。而这一点，又直接和他对高行健的理解相关联。“极左路线早就垮台”云云，实在只能说是善良人们的一种善良愿望，事实远非那么简单。更何况，现在的一些做法，确实比八十年代高明多了，“外松内紧”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了的。不是其中人，

不容易看出其中奥妙。而对此，一直身居国内的张颐武，则应该是深明底细的。

除了上述这一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文艺理论上的分歧。时代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有关文学宏旨的问题，是否依然不容自由讨论？如若不然，仅仅因为高行健的获奖而对他大加声讨，是不是显得有欠公允？看得出来，郭枫老先生自己一直是虔诚的信奉着什么的，并且当他发现有人试图从根本上动摇自己所信奉的东西时，表现出一种真诚的愤怒。

基于这种真诚的愤怒，郭枫文中出现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说法，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比如，对高行健“逃亡”法国，郭枫极不以为然。所以在批判了高反对民族主义的理论之后，就有这样的说法：“刚刚取得法国籍的高行健，马上便谴责民族主义是狭隘的思想，未免转变得太快了些。”事实是，高行健上述被批判的内容，是１９９４年１月３日同法国作家德尼·朗格里对谈时讲到的，而他取得法国国籍，则是１９９７年的事。所以不存在先取得法国国籍，然后便批判民族主义的可能。郭枫尽可以对高行健其人其文以己之见严加批判，尊重事实这一基本前提还是不应被忽略的。

总而言之，郭枫的文章，反映的是他那一代人的思维及其结果。真诚、固执和直线性。我不想对此过多的说三道四。本来，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出名后，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出来是正常的，什么都不让说，讳莫如深，才是不正常的。可惜的是，即使是郭枫的文章，也只能出现于网上，而无法见之于大陆的任何正式出版物。比起种种赞美的或指责的意见来，这一事实本身才是最让人遗憾的。

三，其中底里

在对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引起的种种反映略作浏览之后，我们是否可以透过这些反映的表面现象，对隐藏其后的东西，做一番贸然触摸？

说起来，高行健获奖一事，关联到的方面很多，已经绝对不仅仅是如何评价一个作家及其作品那样单纯的文学评论的问题了。如果想化繁为简，进行一番最为简单化的梳理的话，是否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一是中国政府官方的反映，二是知识分子的反映。

从表面上看，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比以前是宽松多了。如果说八十年代还曾有过类似“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几次拉锯战的话，进入九十年代，接受了“天安门事件”的教训，由上而下大规模的批判什么反对什么的运动已很少出现了。但这决不意味着党对文学艺术等的完全放手，只是做法比以前“聪明”了许多而已。比如说，除了在基本文艺政策上“按既定方针办”

以外，还辅之以其它行之有效的行政的及经济的控制手段，对违禁者处以罚款或强令停刊等等。这就是所谓“外松内紧”的安天下之妙计。这样，不仅避免了原来“批谁谁香”的“不本意”后果，且令即使有心尝试禁果却不得不为本单位职工的利益三思而行的出版社头头们望而却步。这些招数果然灵验，让人们在无可奈何中变得服贴。于是，终于天下太平而至于凤凰也要来歌舞於庭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像一颗定时炸弹突然爆响。措手不及之下，一方面是代表中国官方态度的“作协负责人”的发言草草出台，同时，在内部立刻也就对出版有关高行健的东西下了严格禁令。于是，就造出了一百年来首位华文作家获奖而在中华土地上却不许堂而皇之的被华文印刷出版这么一个“百年荒唐”。

其实，这一“百年荒唐”发生在中国大地，也并非完全无理可循。虽然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了，在意识形态方面，既有十七年“成功治理”的经验，也有天安门事件的“沉痛教训”，“党的领导”这根弦一刻也未曾放松。高行健１９８３年的实验戏剧《车站》一出来，就被当时中宣部文艺主管贺敬之点名为“建国以来最恶毒的”而遭批判[4]。九十年代后，那种易招人反感的粗暴批判渐渐变得不显山不显水了，可有谁能否认领导者们“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之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与政治有关（哪怕是只有一点点关系）的敏感问题上。现为美国密西西比大学现代语文系助理教授的杨小滨，对此有这样的论述：

> 由于高行健近年作品流传的范围有限，政治性似乎成了他获奖之后的中心（假如不是唯一的）话题。这对近年来竭力逃避政治罗网的高行健来说颇具反讽意味。
>
> ……
>
> 文学艺术作为社会的反题，是阿多诺（TheodorW. Adorno）在《美学理论》(Aesthetic Theory) 中反复强调的文学艺术的政治功能。对政治的拒绝，由此不能不被看作是一种个人的政治姿态，高行健作品的非政治性可以说恰恰是他政治理念的表达。毫无疑问的是，高行健对政治的反感来自他个人经验里的政治生活所留下的心理创伤。对于这种心理创伤，我们或许应当遵从弗洛伊德的方式，从沉默、否认或隐喻中去指认。
>
> 拒绝政治，恰恰是因为异议政治在话语方式和操作方式上与主流政治的同谋。（试想，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共产党不也是异议政治的代表吗？）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官方的担忧或许并不是绝对的愚蠢。[5]

几乎所有的有关文章，包括一些否定高行健的文章，都认为中国官方的“禁高”行为是很愚蠢的。而杨小滨的这最后一句话，并不是直接的正面否定，却也许更能发人深思？

从某种角度讲，高行健获奖一事是一个契机，它使得十几年来渐入云雾的党的文艺政策又一次得以“偶尔露峥嵘”。虽然尚不知目前这种“鸵鸟政策”还能维持多久，却多少让人明白了一点：在可被期盼和不可被期盼的事物之间，有时还是需要“划清界限”的。

与此相对，知识分子中的各种反应，其实更值得人们注目。因为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姑且将它称为“事件”），也微妙的折射出中国学术界、准确的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趋势。

稍微做一点历史的回顾，在整个二十世纪，一个国家的文学（包括文学研究），与那一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动态等如此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的，除了中国，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个（即使是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前苏联，也和中国不一样）。特别是从上世纪中叶，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多次运动都是从文学艺术开刀。文人学者的命运，如此出乎人们预料的被与当权者意志相绑。既有为此而荣升位至极权的，也有为此而吃尽苦头甚至丧失生命的。在这种长期的政治纠缠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训太深太多。连曾被领袖誉为“骨头最硬”的“民族魂”鲁迅，在几十年来的诠释中都被抽去了怀疑与批判的内核而成为由“主流意识形态”任意捏塑的偶像，或者不排除如仍在世有被送进监狱的可能[6]，还剩下什么东西是能够并且值得坚持的？

然而这毕竟还是个曾经拥有过鲁迅的国度。尽管面对的是与鲁迅已经完全不同的对象，为了坚持自己所信奉的什么，或而意志坚定的或而虽犹豫彷徨却始终不放弃抗争的人终于没有绝迹，并且在无形中成为一种虽然微弱，有时却可以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发出异议的力量。特别是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当人们可以面对的选择渐渐多起来之后，这种批判力量的逐渐增强也越来越明显了。八十年代中，不断有一些文学评论、艺术争鸣之类的文章，会在远远超过一专业的范围中引起更大反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从这些带有“异端”倾向的文章中，表现了向长期以来独霸全盘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对抗和批判的姿态。

进入九十年代后，情况变得复杂化了。以“天安门事件”争取民主运动的失败为契机，不仅官方的政策（策略）有所改变，知识分子中也由对民主运动的反思开始分化。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这一词语的被频繁使用，

对很多历史的、现实的问题的思考，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角度、多元化倾向。这种多角度多元化倾向，一方面将已有的问题意识（或思考）向更为深入的层次推进，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知识分子中由意见相左而产生的严重分歧、对立。从前以为理所当然应该如此只能如此的东西被重新审视，比如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所开创的，以“五四”为起点的整个一个“现代史”，都在“现代”和“后现代”之争中从根本上被质疑。就是说，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他们那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及由其衍生的国人之国民性的批判与抗争，被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重新考察究竟还是否具备其合理价值？而另一方面，以前认为毋须如此不应如此的东西却被重新高扬，比如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的不断肯定与强化。知识分子中这种分歧、对立与分化，既有可能是面向未来重振旗鼓的整顿，同时却造成了一个已无法回避的事实。那就是八十年代那种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力量的大大削弱。甚至可以说，知识分子的对立分化中就潜藏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流”倾向。

借用现在流行的“全球化”视点来看，知识分子渐渐丧失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并非中国一国的现象，而呈现着世界性趋向。但以中国所面临问题之复杂，中国知识分子总体所承载的历史积淀，轻易就放弃批判的立场，恐怕不可避免的会引出来自各种不同层次包括知识分子自身的不同意义的质疑。

高行健在２０００年度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正值新旧世纪之交，诺贝尔奖颁发的第一百年，有时间上的巧合，而且十分微妙的折射出发展到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一些易被人们忽视的方面和问题。人们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各种不同反应，除了个人的文学口味和喜好之外，显然还与更深层次的问题相关联。以前面所举之例来看，钱理群在未读过高获奖作品的前提下，近乎本能的做出那样的发言，实际上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了他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种一贯不变的立场和态度。而张颐武的文章，尽管也有锋锐的矛头，其批判指向的不确实性和他缺乏充分力据却急于做出定论的仓促草率，则无法掩饰隐藏于文章之后的多年来若隐若现的一种“合流”倾向。

当然，事情远非如此简单。正如高行健极力反对将文学与任何一种功利的目的相绑一样，仅仅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做出结论也是很不充分的。只是，本文在这里，只是针对高行健获奖后的各种反应，就自己所能搜集到的极为有限的材料，提供了极为有限的一种思考。至于我自己，对高行健的作品如何看，就要留待下一步的文章中去再做表述了。

注：

1 引自刘再复「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明报出版社《论高行健状态》，刘再复著，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初版，Ｐ１６２－１６３。

2 《解读高行健》，林曼叔编，明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初版，Ｐ９８。

3 《中文导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６日，Ｎｏ．３４８。

4 赵毅衡《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建立一种现代禅剧》Ｐ３３，台湾尔雅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２月二印版。

5 《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０年１２号，第６２期。

6 这是在最近的《读书》杂志中被逐渐明了化的一个话题。详见《读书》２００２年３、７期。

附注：

其实，就在拙文即将结束之际，在网上又发现了大量有关高行健的文章。写得比较多，影响较大的，当数在美学者曹长青。他不仅认认真真看了高行健的作品，而且还认认真真的写了系列批判文章从一到十一。可是，出于种种考虑（主要是本文篇幅的原因）还是暂且略去了。另外，广东有一些人专门召开了高行健讨论会，在国内买不到高行健作品的情况下，一部几百页之厚的书（《灵山》等）不惮其烦的从网上下载来看，看过之后参加讨论。这个讨论会很少“烟火味儿”，学术气氛比较浓。发言水平参差，其中有些质量比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体现了中国今后文学评论学术发展的方向。可惜的是，因篇幅太长，这里也只好割爱了。